

· 文献研究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研究新进展

罗 星

【摘要】：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几十年来一直是指导党史国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党史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决议本身的研究也不断有着新的进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着决议的形成过程、决议起草过程中人物所起的作用、决议内容本身、历史影响，党史国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系统性述评，可以为进一步深化对决议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第二个历史决议”；理论工作务虚会；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7-0080-08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或决议)，被学术界公认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完成了拨乱反正。^①这篇文献一经发表，就立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无论是这篇文献的起草和发表过程，还是其中涉及到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都是学术界研究的关注的重要话题。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内的泛滥，更突显了深化对《历史决议》研究的必要性。

一、文献形成的历史过程：从不急于做决定到立即进行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了实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就是一个躲不开和绕不过的问题。如果党内不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一个共识，很难真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在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议，邓小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其实早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上的一些议题就已经触及到了党的历史问题。比如陈云提出的平反冤假错

案的问题，特别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一部分参与者已经提出要对党的历史进行评价。在西北组的讨论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同志提出要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入的总结。有些同志在发言中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值得总结。现在全党和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够在台搞了十年，根本教训是什么？^②但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虽然适当的时候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进行。因为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解决历史上一切历史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任务。^③之所以不必匆忙进行，用邓小平的话讲是“一方面在改革初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有些事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 1976-1984)》，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4 页。

^②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5-196 页，第 220-222 页。于光远：《1978 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5 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 页。

情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是再来说明这样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的更好”。^①但不久后，邓小平就改变了原来的初衷，提出决议起草要“立刻进行。”

“立即进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使得中央不得不提前决议的起草时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指出，1979年1月，旨在统一全党思想、消除分歧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务虚会坚持“不设禁区、不下禁令”的原则，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有一些人没有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抵制；而另一方面，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等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片面地、不恰当地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由于这些人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又利用了十年内乱期间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迷惑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②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提出了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实际上，这次会议开启了全面总结和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历史问题的序幕。这次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的突出特点体现在讨论历史的跨度大，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会者对从“路线斗争”角度评价党的历史的方法产生了质疑。而会议期间出现的在一些问题上的思想的混乱，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起草历史决议的极端重要性。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提前启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重要原因。^③王涛认为，这次会议的主题虽然围绕理论展开，但其对中共历史的讨论更为精彩，其涉及到的党史问题有对前十七年（1949—1966）的回顾与总结，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中共执政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开始探索中共历史叙事的方式。^④而在后来进行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决议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特别是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开展，更加凸显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不对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不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科学的定位，解放思想根本无从谈起。

做出这样一个决议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选取一个适当时候，即使到了1979年的3月份，邓小平仍然认为“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⑤程中原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认为，国庆30周年讲话实际上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一个前提。197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不能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需要对过去三十年进行一个总结。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讲一些新的内容，提高一个新的水平，并亲自参与指导讲话的起草和修改。而在国庆讲话起草的过程中，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讲话中提出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充分肯定了其在建国后17年的功绩，对其失误和缺点没有进行直接批评；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文化大革命”本身不进行分析，集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唯一涉及到毛泽东错误的地方，采取了不设主语的形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③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④王涛：《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大讨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⑥这三个问题主要是：第一，涉不涉及三十年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问题是对哪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以示怀念；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的错误。

式。虽然这次讲话并不是对建国以来历史的一次全面总结,但和过去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和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历史决议和国庆讲话有某种“血缘关系”,历史决议可以看做是对国庆讲话的集成和发展。^①萧冬连认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国庆讲话不久就开始启动了。10月下旬,邓小平和胡耀邦、姚依林等谈话,部署1980年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把起草历史问题决议作为四项工作中的一项提出。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召集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了。^②

二、人物研究：关注重要人物在决议成文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唯物史观,承认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丝毫没有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行动构成的。”^③对于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这种重要作用就更加被凸显出来。所以在对历史决议的研究过程中,人物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决议,其形成固然也离不开个人的功劳。历史决议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以及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早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新的概念,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④关于邓小平在起草决议中发挥的作用,学界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⑤关于邓小平与决议起草的关系问题,宋月红认为邓小平对于决议起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体现在为决议的起草确立了指导思想。^⑥陈东

林认为,从决议开始起草到最终正式通过,邓小平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先后发表谈话、讲话十多次。首先集中体现在其为中央做出起草《历史决议》的决策做出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从复出之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就强调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确立了起草过程中的中心意思,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最后是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另一方面他审时度势,能够把握起草决议的最佳时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说《历史决议》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是没有问题的;刘金田认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历史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对毛泽东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把握了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全面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提出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错误。^⑦陈东林认为邓小平也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集中体现在当代史研究和教育要树立的大局观,要树立牢固的政治意识,其次要实事求是分析当时的历史。^⑧对于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

①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15—422页。

②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58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130页。

④《邓小平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⑤陈东林、李建斌:《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述评》,《邓小平研究述评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研究综述》,《邓小平研究述评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48页。

⑥宋月红:《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理论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

⑦刘金田:《邓小平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⑧陈东林:《邓小平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①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组成人员，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这方面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普遍认为陈云不仅为确定决议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决议的起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直接影响了决议的形成。宋月红认为，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陈云和邓小平保持高度的一致，先后对起草工作进行了多次指示，特别是在陈云的提议下历史决议的写史范围从“建国以来”延伸到“建党以来”，这就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更能够凸显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建议提倡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这个建议是和陈云主张在决议中“写党的六十年”密切相关的。这些建议最终体现在了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问题上，陈云主张坚持“交换、反复、比较”的认识方法，强调错误的发生有一定的思想根源，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要对错误进行客观分析，不能抹杀成绩，也不能掩盖错误，对待错误问题要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②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对待党史的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即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看待党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历史问题，善于处理党史研究中的敏感问题。^③

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界开始关注到了以黄克诚为代表的一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共产党人，仍然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武国有、林建公等人认为，在1980年11月中央纪委的会议上，黄克诚着重谈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从我们党的历史谈起，用了两个多小时，从六个方面回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

献。如果把过去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人承担责任，不符合历史事实。特别是黄克诚指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的无一不是处。这样做不仅从根本上违反事实，而且对党和人民非常不利。有些同志受过打击，有一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绝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只能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角度出发。黄克诚的这个讲话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得到公开发表，许多人看到此文非常感动，一个饱受磨难的同志还能够不带个人感情色彩来评价历史，其他人还有什么理由感情用事呢？应该说，黄克诚等人开阔的胸襟和历史的担当为决议的出台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近些年来，围绕黄克诚等人物的研究也开始展开并得到深化^④。

胡乔木作为决议起草的具体负责人，在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的同时，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也做出了自己贡献。而目前国内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共收录了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十八次谈话。据邓力群的回忆，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方案的提出到决议的修改，都倾注了他的不少心血。^⑤龚育之说过，因为乔木同志是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谈的次数最多，内容最广，思路最宽，所以深入研究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8页。

②宋月红：《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和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宋月红：《从“建国以来”到“建党以来”的发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写史范围确立过程探析》，《北京日报》2014年7月2日。

③丁俊萍、易振龙：《陈云党史观的鲜明特色及其当代价值》，《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

④参见武国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7-1991）》，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5页；林建公：《黄克诚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文汇》2002年第10期。

⑤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436页。

胡乔木在决议起草中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①鲁书月认为,胡乔木起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其对“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分析上,他没有简单化地把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归结于毛泽东个人身上,也不同意简单从阶级根源上找原因,也不同意沿用第一个历史决议所采用的社会、思想、历史三大根源的范式,而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和中国封建社会遗毒影响是发生文革的重要原因;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坚决反对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改变、浩劫,而主张把起定性为内乱,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认可;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提法,认为不但不能够采用,而且应该加以批判;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上,在坚持维护原则的基础之上,提出区别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科学概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坚持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不提路线斗争;在决议的最后一个部分,坚持对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实际上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②在人物研究的方面,对邓小平、陈云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下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可以集中在其他一些领导人,比如胡耀邦、邓力群、李先念等人分别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的贡献,这样可以历史活动中具体个人的角度进一步把握决议的科学内涵。

三、核心内容：坚持基本结论又实现与时俱进

《历史决议》主体部分涉及到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的历史。

首先,决议从总体上对于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总结概括了建国三十二年

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进行了系统归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增长;科教文卫事业有巨大的发展等。^③应该说来,这样的概括阐明了指明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主流。之后历届领导人在许多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着重强调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成果,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

其次,研究者认为决议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清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和党和人民在这十年中进行斗争之间的关系,全面科学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分析是完全合乎实际的、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今天看来这些评价也是完全正确的。^④这反映了一个政党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待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

^①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的访谈录》,《百年潮》2001 年第 6 期。

^②鲁书月:《胡乔木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贡献》,《学习时报》2011 年 6 月 27 日;程中原:《胡乔木与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党的文献》2002 年第 3 期;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闻言:《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重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党的文献》2016 年第 3 期。

是敢于承认，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①

第二个方面是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走向问题，决议拒绝了一些人提出了所谓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为前后“两期说”的观点，决议突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不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归结于毛泽东一人身上，不从个人品质角度对错误进行分析。既指出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 error，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研究者认为，在毛泽东思想方面，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把毛泽东思想看做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和指导思想，批评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两种错误态度：一个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一种是根本就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说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②

对于《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来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在涉及的一些其它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在不断拓展、深化和向前推移。桑东华认为，比如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决议仅仅是提出了这个概念，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并对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决议由于时代的限制，认为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的作用，这反映出了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而随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我们对所有制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发展。^③同样，肖光文的研

究中也指出，从决议发表以来，我们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 29 年的历史评价的认识也不断在发生变化。^④从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决议》本身也是历史的，要求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去对待的，不可拘泥于决议中的个别论断。龚育之也指出，历史决议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决议的基本结论，到现在还是站的住脚的，另一个方面是建立在基本结构之上的具体论断，需要不断深化和发展。事实上，坚持《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与推动《历史决议》的与时俱进不仅不是互相矛盾的，而且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深远影响：对历史决议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关于《历史决议》的地位，用龚育之的话讲，叫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这个说法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历史决议的影响既体现在政治层面，又体现在理论层面。政治层面的意义，在历次中国共产党会议和相关领导人讲话中都有了明确的表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影响。^⑤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决议“既对多年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⑥，1992 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随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93-694 页。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93 页。

③桑东华：《三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几个重要论断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④《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若干新认识》，《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2 期。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48 页。

⑥《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2-203 页。

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出党作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①郑谦认为,《历史决议》即是渐进式改革的产物,也为中国推动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一个思想解放、认识统一、有崇高威信的党,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一个既有连续性又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②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支持起草决议和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做秘密报告评价斯大林进行一个比较,我们更能够认清历史决议深刻的政治意义,前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而后者则造成了苏联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思想理论的混乱。

从对推进党史国史研究的角度分析,《历史决议》对指导党史国史研究起到的是奠基和指导作用。正如习近平在 2010 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重要的是正视失误和曲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学习和增长本领。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这可以从党中央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中得到生动的证明”。陈东林认为,《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国史研究的起步和国史学科的开创,而《历史决议》的相关论断也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决议对党史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比如说如何看待历史中的成就和失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等都进行了科学的回答;《历史决议》研究评价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方法,是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说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评价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能感情用事,过多追求个人的品质和责任等。^③朱佳木认为,《历史决议》的制定过程,也是一次高层集体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过程,起到了积极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作用,《历史决议》所论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也是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④王炳林认为,在《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善于集思

广益,大规模进行党史研究,决议的通过更是对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决议》对研究历史问题的指导作用,主要集中在研究历史的政治立场、方法论之上,具体深化细节研究还需要具体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关于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关于两个历史决议的共同之处,张健等人认为,两个历史决议都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的科学态度,即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对待党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评价党的历史;抛开个人恩怨,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客观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着眼于长远事业,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⑥穆兆勇从旗帜和道路的角度比较了两个历史决议的异同,即两个决议都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个决议侧重于确立,第二个决议侧重于维护;第一个决议重申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本新的实际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而两个决议的不同之处则体现在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上各有不同。第一个历史决议虽然是为了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但侧重点集中在六界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就没有涉及;而第二个历史决议虽然主要为了总结建国

①《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②郑谦:《〈历史决议〉与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③陈东林:《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国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陈东林:《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④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⑤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⑥张健、任春峰:《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的科学态度:以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上确是从建党以来算起，甚至涉及到了两年徘徊时期的历史。因此相比于第一个决议来说，第二个决议关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完整、主线更加清晰、框架结构更加合理。^①除此之外，相比于第一个决议，第二个决议在分析问题和错误的时候没有简单从阶级根源和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论证，这是非常有益的。

五、研究前瞻：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思考

在当下，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历史决议》的研究，需要从新的地方着手进行思考。

一方面是从微观领域着手，最近已经有学者开始了从起草过程中史料运用的角度，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这是极具意义的，可以从我们进一步廓清历史脉络，还历史本源。作者已经挖掘了许多关于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思想史料。但除此之外，它认为李先念、黄克诚、彭真等人的关于决议的思想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挖^②。关于决议产生的背景的材料已经挖掘比较多，但在决议形成过程中的讨论的研究的材料还显得相对较弱，比如关于四千人大讨论、政治局扩大讨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通过史料的挖掘来还原整个过程。实际上，整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不仅是中央领导起草小组进行反复研究讨论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中央集体领导下，在中央机关乃至全国不同范围内进行讨论修改、补充，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共同修改的一个过程。无论是决议的起草、定稿以及修改，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高度活跃。下一步对决议研究的重点可以集中在决议的制定过程对我们党科学决策有什么启示，对于推动发扬新形势下的党内民主有什么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决议本身来审视决议，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决议的研究。首先，历史决议对我们写作历史和研究历史有什么启发？决议的写作，是希望确立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是如何通过恰当运用历史叙述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考验的是写史的技艺和水平，无论是叙述的方法、次序还是语调，都值得进行细细推敲。我们可以从邓小平、胡乔木等多次对做出的写作历史过程中的要求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平铺直叙的编年史写法肯定不能达到目的，要善于围绕中心思想进行展开，要写的集中一些，这都是决议在写史的方法上对于我们的重要启示，这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领域。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历史决议》对于我们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哪些方法论的启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逐渐开始在理论界、学术界出现，其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泛滥的重要表现就是虚无新中国建立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美化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国民党；虚无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意义，否定我们前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③此外转换历史主题、伪造所谓新史料、偷换历史范畴已经都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史研究中的表现，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直接威胁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在当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许多从《历史决议》本身中汲取更多智慧，比如说如何认识历史的主流和主线，如何对待前进中的正确和错误，如何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时代的发展使得对于决议研究的价值日益彰显。

（罗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①穆兆勇：《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②宋月红：《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和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朱佳木：《国史研究要注重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